

国统区抗战文学研究丛书

大后方文学史

文天行
吴野 主编

●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二章 小说	(20)
第一节 概述	(20)
第二节 巴金	(56)
第三节 茅盾	(72)
第四节 老舍	(87)
第五节 沙汀·路翎	(102)
第六节 艾芜·骆宾基	(123)
第七节 王西彦·靳以·萧红	(144)
第三章 诗歌	(169)
第一节 概述	(169)
第二节 艾青	(218)
第三节 臧克家·袁水拍	(231)
第四节 戴望舒	(243)
第四章 戏剧	(263)

第一节	概述·····	(263)
第二节	郭沫若·····	(312)
第三节	夏衍·····	(324)
第四节	阳翰笙·陈白尘·····	(335)
第五节	曹禺·于伶·····	(346)
第六节	老舍·茅盾·····	(355)
第七节	吴祖光·宋之的·····	(363)
第八节	张骏祥·沈浮·····	(372)
第五章	散文·····	(380)
第一节	概述·····	(380)
第二节	丘东平·碧野·····	(438)
第三节	曹白·骆宾基·····	(445)
第四节	肖乾·范长江·····	(451)
第五节	聂绀弩·冯雪峰·····	(456)
第六节	《野草》作家群·····	(467)
第七节	郭沫若·闻一多·田仲济·秦牧·····	(477)
第八节	茅盾·巴金·····	(483)
第九节	李广田·缪崇群·沈从文·····	(490)
第六章	通俗文学·····	(500)
第一节	概述·····	(500)
第二节	老舍·老向·····	(526)
第三节	赵景深·穆木天·····	(533)
第四节	光未然·胡绍轩·····	(538)
第五节	谷斯范·王永梭·····	(542)
第七章	文学批评理论·····	(553)

第一节	概述.....	(553)
第二节	郭沫若.....	(599)
第三节	茅盾.....	(610)
第四节	邵荃麟.....	(621)
第五节	以群.....	(632)
第六节	胡风.....	(641)
是终点，也是起点.....		(653)

●本书系四川省社科联资助课题

● 第一章 绪 论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时光已经流逝了将近半个世纪。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被载入了历史教科书，被“存入”了档案馆和各类军事历史博物馆中了。但是，作为曾经改变了千千万万人的命运、改变了世界面貌的一段历史，它却以神奇的力量渗入了在它结束之后才展开的现实生活的进程之中。在物质层面，它留给我们的，可能是弹坑与废墟，白骨与坟墓。但在精神层面，它留给我们的东西，却可能要丰富、复杂得多。不断从新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一历史时期的精神文化活动，领悟蕴涵其中的教训，对于我们这一代，甚至对于今后若干代人，都会是有意义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神州大地上进行的中国人民反击日本侵略者，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抗日战争，是中国现代史上华光四射的篇章。它不但捍卫了祖国的独立与民族的尊严，而且对促进民主运动，推动社会革命，有着重大的积极的作用，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奠定了广

泛而坚实的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学艺术运动，是发端于“五四”的中国新文学运动的重要历史阶段。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学运动，由延安文学运动、敌后抗日根据地文学运动，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文学运动、“孤岛”文学运动、沦陷区文学运动等组成。其中，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文学运动和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文学运动影响最大。诚如茅盾所说：“中国抗战文艺运动实开始于‘七七’以前，可‘七七’以后这‘老根’派生了两支，一在大后方，一在边区和解放区。这两支所托的土壤不同，所呼吸的空气也不同，所受的风日雨露霜雪也不同，也就决定了它们各自的发展也不同。更由于政治上的关系，这一本派生的两支，多少年来就连交换经验的机会也少得很。然而无论如何，它们总是同根生的。它们的立场是一致的。这就是从属于民族解放的最大目的——抗战，从属于当前最高的政治要求——争取民主。它们的方向也是一致的。这就是实现那多少年前就已经提出的口号——大众化”。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的若干种现代文学史与有关的研究论著中，抗战文学运动没有得到与它的历史功绩相适应的重视，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抗战文学运动这一支，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与深入的研究。

—

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文学运动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继承和发展。

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揭开了新民主主义的序

幕，也揭开了中国文学史的新篇章。毛泽东同志指出：“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①从一开始起，“五四”新文学运动就把文学的变革与发展，同民族革命、社会革命的展开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热切地关注现实，积极地以文学创作参与社会变革，为改造世界而表现现实，并逐步寻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装，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热情支持与有力领导。这个优秀的传统像一根粗大的红线，从“五四”新文学运动一直贯穿到抗战文学运动中。它贯穿在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抗战文学运动中，也同样贯穿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抗战文学运动中。

大后方抗战文学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开展起来的具有广泛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文学运动。党的长江局、南方局以及周恩来等领导同志掌握着文学运动的大方向，并通过重庆《新华日报》，通过郭沫若、茅盾等著名作家，通过许多党员作家和进步作家，实现了对大后方抗战文学运动的实际领导。党的领导保证了大后方抗战文学运动正确的方向，团结了广大爱国的要求进步的文学界人士，推动了文学和现实的结合，使大后方抗战文学运动能够稳步开展，取得丰硕的成果。

1938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标志着大后方抗战文学运动已经越过初期仓促应战、分散零乱的无组织

① 《新民主主义论》，见《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状态，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是在“左联”解散以后，在中国文艺家协会和中国文艺工作者协会的基础上，重新建立的具有广泛性的统一战线组织，标志着中国文艺界空前的大团结。围绕着抗敌文协的成立而形成的三个文献：《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旨趣》、《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言》和武汉新华日报为此刊发的社论《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集中地表现了文学界对抗战文学运动的性质和它肩负的历史使命，发展抗战文学运动、促进文学创作的方针与途径的明确的理性的认识。

首先，这三个文献以及一些有影响的作家理论家的有关论述都强调指出，抗战文学运动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延伸。它上承“五四”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战斗品格，在当前，着重为民族解放，同时也就是为建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而进行斗争的文艺运动。《新华日报》上述社论指出：“中国的新文艺运动，是从中国人民大众参加民族解放斗争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一开始便肩起了这个伟大斗争的使命”。《宣言》强调：“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历史，才只有短短的二十年。在这二十年中，内忧外患，没有一日稍停，文艺界也就无时不在挣扎奋斗。……这二十年中的文艺，是紧紧伴着民族的苦痛挣扎，以血泪为文章，为正义而呐喊。……就最近的事实来讲，九一八与一二八后，文艺界无日不在忧心国防……救亡图存，咸具此心”。这里提出和回答的，正是要求正确认识在“七七”以后所面临的形势，认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学运动的性质和任务，以求为抗战文艺运动——中国文艺界前所未有的大团结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周扬在全面抗战进行了十个月时

所写的《新的现实与文学上的新的任务》中，更为明确地指出了抗战文艺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承传关系。他指出：“中国新文学运动是一直和民族解放运动不可分离的。……反帝反封建的主题贯串了从《狂人日记》以来的一切优秀的作品。国防文艺，抗战文艺是这个传统的正当的继承”。对抗战文学运动的性质的认识与强调，对于文学创作突破初期的“前线主义”、“摄影主义”，向着现实生活的纵深开拓，向着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迈进，起了重要的保证和指导作用。

其次，三个文献旗帜鲜明地主张，抗战文学运动继承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光荣传统，自觉地把个人的命运同民族的命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密切关注重大现实矛盾，自觉地呼喊出民族的心声。在整个民族投入抗日战争的客观形势下，作为抗战文学运动中坚力量的作家理论家，从文学与民族命运关系的高度，加深了对中国文学运动的历史特点和发展规律的认识。

《新华日报》上述社论指出：“文艺家是民族的心灵，民族的眼和民族的呼声，没有一个伟大的文艺家不为着自己民族的健康和繁荣而尽力，也没有一个向上的民族，不敬爱自己的文艺家”。文学和民族命运紧紧相联。“民族的命运，也将是文艺的命运”。（《发起旨趣》）文学必须和人民一道为实现民族的解放而斗争。这是抗战文学界大多数人的共识。这种共识凝聚为《宣言》为抗战文学运动所规定的任务：“对国内，我们必须喊出民族的危机，宣布暴日的罪行，造成全民族严肃的抗战情绪生活，以求持久的抵抗，争取最后胜利。对世界，我们必须揭露日本的野心与暴行，引起全人类的正义感，以共同制裁侵略者。”

第三，三个文献有力地指出了抗战文艺必须走大众化的道路，这样，不但才能适应形势的变化，满足时代的要求，而且，也只有和在人民大众的结合中，在和时代生活的结合中，文艺才有可能求得健康的发展。大众化问题当然不是大后方抗战文学运动新提出来的。在二三十年代的新文学运动中，它就曾经被多次地提出来，并曾多次得到广泛的热烈的讨论。但是，正如《新华日报》上引社论指出：“文艺大众化的问题，提出到现在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但到今日为止，无论在理论上在实践上，不可讳言地还只有局部的成就”。在抗日战争全面展开的新的历史阶段，战火燃遍全国，作家的生活与大众的生活因抗战而呈现打成一片之势，“因此，这个新的阶段，也正是大众化问题有可能尽量展开与彻底解决的阶段”。社论明确指出：“文艺的大众化，应是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最主要的任务”。抗敌文协主办的《抗战文艺·发刊词》更明确宣布以大众化为抗战文艺的“总原则”。它指出：“现在，面对着这样紧张的局势，我们应该严重地提出，‘大众化’是一切文艺工作的总原则，所有的文艺工作者都必须沿着‘大众化’的路线进行”。

第四，三个文献一致强调，抗战文艺运动是中国文艺界广泛的统一战线，应当最大限度地团结文艺界一切爱国抗日的力量，分工合作，各尽所长，以切切实实地促进文艺界的团结，共同为完成民族解放的神圣使命而奋斗。《发起旨趣》回顾往昔的教训，诚恳呼吁文艺界的团结：“过去中国文艺界虽有过几次全国性的组织，但是因种种原因不能一致，总不能有良好的成果。现在情势已完全不同了，全国上下，已集中目的于抗

战救亡……政治上的统一战线日益巩固，……”“我们感到文艺抗战工作的重大，散处四方的文艺工作者有集中团结，共同参加民族解放伟业的必要”。《宣言》指出：“在这神圣的抗战中，……每个人都想竭尽才力，切盼着相当的收获，可是每个人都遭遇到这定非单人独骑所能克服的艰难。我们必须联合起来”。“总之，我们必须把力量集聚到一处，筑起最坚固的联合阵营，放起一把正义之火，烧净了现在的卑污与狂暴”。三个文献还为文艺界的大团结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要求，以求抗敌文艺统一战线的巩固。《新华日报》上述社论着重指出了团结必须以共同的目标为基础：“尽管在阶级，集团，世界观，艺术方法论上大家有着各自的特性，然而一个高于一切的共同的目标——抗敌，比什么都有力地使大家成为亲密的战友”。《宣言》为巩固和扩大抗敌文艺统一战线提出了“分工合作，各尽所长”、“统盘筹妥”、“在统一战线上我们分工，在集团创造下我们合作”、“化整为零，不失联络，化零为整，无虑参差”等原则性要求，对开展创作、批评与翻译，也提出了指导性意见。这对于大后方抗战文艺运动的顺利开展与文学创作的日趋活跃，有着重要的意义。

从1938年春到1945年秋，在极其困窘的物质条件下，特别是在越来越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抗敌文协做了大量的工作，让抗战文艺的旗帜在祖国西南始终飘扬。

总的说来，抗敌文协的工作是根据党的路线、方针，在长江局、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动员、组织广大爱国的进步的作家，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文学活动，巩固和扩大抗战文艺统一战线，推动现实主义文学艺术的发展，促进文艺的大众化。但

在皖南事变前后，由于形势的需要和条件的变化，工作重点略有不同。比较而言，大约成立之初，较侧重于抗日的宣传鼓动工作。如负责扩大宣传周、文化日之宣传；撰写宣传鼓动性质的小册子、传单；组织会员去前线慰劳抗日将士，接待各国来华有关的组织与人员等。文学方面，重要的活动之一是出版会报《抗战文艺》三日刊。从武汉失守到皖南事变是抗敌文协活动最多，成效也最大的时代。除继续组织或参与上述各类社会活动外，并以更大的力量积极开展文学活动。据抗敌文协研究部报告，从总会迁渝起至1939年底止，抗敌文协先后召开了九次诗歌座谈会，多次戏剧座谈会和小说座谈会，举办通俗文艺讲习会，探讨创作问题，交流创作经验。抗敌文协一方面组织“作家战地访问团”，帮助一批作家亲临前线，与抗敌将士接触，既宣传了抗日，激励了士气，也使作家能更好地了解现实，接触社会。另一方面，抗敌文协又专设国际宣传机构，组织“作品出国”，向世界各国介绍我国抗战文学作品，以扩大影响，争取支持与同情。同时，抗敌文协还积极在各地筹建分会，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成都、昆明、桂林、香港等分会相继诞生。皖南事变后，白色恐怖日甚一日，抗敌文协处境艰难。但是，抗敌文协并没有停止自己的活动，而是以各种巧妙的形式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不但继续着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而且还加强了争取民主的斗争。这一时期，抗敌文协组织或参与组织了大量的纪念活动，如纪念鲁迅先生逝世，纪念郭沫若、茅盾、老舍、洪深等的寿辰与创作活动，纪念高尔基、普希金等等。通过这些活动，抗敌文协宣传了党的抗日争民主的方针，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与党的文艺

方针政策，增强了对进步文艺人士的凝聚力，把他们团聚在党的周围，有力地支持了国统区群众掀起的民主斗争，也推动了文学创作与时代生活的结合，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二

历时八年的大后方抗战文学运动有着丰富的内容，众多的层次。要而言之，可以说，文艺界统一战线，现实主义文学，文艺大众化，是它的三个组成部分。它实现了中国文艺界前所未有的大团结，把一切爱国的，革命的，进步的，正直的文学工作者团结在抗日救国的大旗下。后来，为了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民主，反对倒退；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加强了民主斗争，使爱国抗日与争民主相结合，在复杂的斗争过程中，使许多文学工作者了解了党的方针政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这就不但推进了全面的抗日斗争，而且也为胜利进行解放战争，甚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的文艺事业的建设，作了思想准备与文艺骨干准备。它旗帜鲜明地要求并积极引导文学与时代结合，为神圣的民族革命服务，有力地促进了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发展。文艺的大众化问题以及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的理论探讨与实践，不但卓有成效地导致了通俗文学创作的兴盛，密切了文学与人民大众的联系，而且，在理论上的深入探索，也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大后方抗战文学运动致力的主要方向，或者说，使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赢得了独特位置的，当然是抗日战争时期文学创作所创造的实绩。从总体上说，大后方抗战文学运动比较好地处理了文学与战争、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它旗帜鲜明地把文

艺的命运同民族的命运联结在一起，大力主张文艺密切与现实斗争的关系，密切与人民大众的关系，从而使大后方抗战文学创作扎根于深厚的黑土，获得刚劲、新鲜的生命活力。同时，几乎从一开始，它就在不疲倦地同种种背离艺术规律的现象与论点进行斗争，通过文学批评与论争的方式解剖着荡涤着“前线主义”，“摄影主义”，“差不多”现象，公式化、概念化，廉价的乐观主义，文坛上的市侩主义，为抗战文学创作的发展扫除障碍，纯洁空气。当然，这当中不是没有曲折，没有失误，但它总是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断地总结与反思，深化着理性的认识，从而使抗战文学一步步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八年的大后方抗战文学运动，可以以1938年抗敌文协的成立和1941年皖南事变作为两个界桩，划分为三个阶段。从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创作自身的起伏上，也可以看出这三个阶段的痕迹，虽然，不同文体在不同阶段的起伏盛衰自然是不尽一致的。抗日战争初期，大后方的文学家们怀着高涨的爱国热情，纷纷自觉地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之中。他们不仅用笔墨，而且还以参加作战部队，参加难民收容所、伤兵医院和口头宣传鼓动工作，来表达他们的报国热忱。他们满腔的热血在沸腾，在燃烧，他们直接地感知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迅速地创作、发表了大量鼓动抗战热情的诗歌与散文，报导火线情况的速写与报道，记叙抗日英雄人物与普通将士的访问记、印象记，掀起了抗战文学创作的虽然分散但却蕴涵着不可低估的热力的第一个高潮。但是，这时期的创作大多是急就章式的，险恶的环境，急迫的形势没有留给作家详加推敲的余地，人们为它们汹涌澎湃的爱国热忱与刚劲有力的呼号所感动，容忍了它

们艺术上的粗糙，但这毕竟是文学创作进一步发展需要超越的阶段。加上北平、上海等文化中心城市沦落，文学社团解体，文学刊物停刊，作家星流云散，辗转流徙，虽然由此而更广泛地接触了社会现实，更深地了解了人民大众的真实生活情形，但携妇将雏，颠沛流离，连最起码的创作条件也无法保证，一时之间自然也还谈不上潜心著述。

从抗敌文协成立到皖南事变这一段时期，可以视为大后方抗战文学运动的中期。战争逐渐转入相持阶段，作家们也得到了虽然艰苦异常，但在战争条件下相对来说较为安定的生活环境，文艺刊物和报纸的文艺副刊初步恢复；文学作品又能获得出版的机会；作为对北平、上海等文化中心城市陷落的补偿，重庆、桂林、昆明、贵阳、成都等文化中心开始形成。同时，作家们对前一阶段的文学创作进行了严肃的反思与总结，对存在着的公式主义、摄影主义等文学现象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与批评。广大读者对文学艺术的要求较前有了明显的提高，强烈要求得到更多更好的作品。审美意识的复苏与强化，对文学审美本性的强调，对艺术创造规律的探求，对抗战与抗战文学的再认识，所有这一切，都促使文学创作大步跨过初期的幼稚，获得了长足的进展。一些充分表现了作家的生活功力与艺术功力、思想性和艺术性和谐统一的优秀的诗歌、小说和戏剧作品，就诞生于这个时期，并且经过历史的筛选，闪闪发光地留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册上。文学批评十分活跃，文学问题的论争几乎贯穿在这一阶段的每一个月份之中，整个大后方抗战文坛呈现出一派精力充沛的活跃状态。

皖南事变后，白色恐怖日甚一日，大后方抗战文学陷入了

极其险恶的政治狂涛之中。进步作家遭到迫害，优秀文学作品不能获得出版的机会，为抗日、民主而呐喊的文学报刊横遭查禁。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专制政策的残酷打击下，文学界少数人思想颓唐，创作上出现迎合小市民庸俗趣味的市侩倾向。文坛变得荒凉衰败。但是，有压迫就有反抗，压迫愈烈反抗愈强。在党的支持与鼓舞下，革命作家、进步作家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相互激励，相濡以沫。他们除了以各种灵活的形式，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外，在创作上还更加清醒地坚持战斗的现实主义，密切和现实生活的结合，密切和人民群众的结合，透过艺术形象的创造，更加深刻地揭露国民党统治地区城乡的尖锐矛盾冲突，更加深刻地把抗日与争民主的主题融合在一起，给予有力的艺术表达。已经被载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册的许多杰出的长篇小说、戏剧作品和诗歌，就是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一些出版于解放战争时期或建国以后的长篇小说，也是酝酿于动笔于这些风雨如晦的年代。这些杰出的小说、诗歌、戏剧作品的问世，表明中国新文学自二十年代发轫，经过三十年代的锋芒初露，到四十年代中后期，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们那个充满血与火的大时代析出的晶体，是大后方的作家在后人难以设想的艰难、险恶的环境中，用自己的热泪和鲜血浇灌出的永不衰败的花朵。它们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留给我们的珍贵文化遗产，值得我们永远珍惜。

三

在30——4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大后方抗战文学运动

当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同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的文学运动、上海“孤岛”的进步文学运动、香港进步文学运动以及沦陷区的进步文学运动一样，都是肇始于“五四”的新文学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演变。它们彼此之间也有着密切的联系，有着相互的影响，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统一形成了中国四十年代的文学面貌。同“孤岛”文学、香港文学、沦陷区文学相比较，大后方抗战文学运动接受来自延安的思想影响更为广泛，也更为强烈。它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方针路线，它热烈地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它虔诚地赞同并力图充分理解和运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基本原理，它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响应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大号召。但是，大后方的文学创作又毕竟有着与延安文学创作大为不同的生存环境。因此，一些文学问题的提出和阐释，创作动向的回旋曲折，自然不能不呈现出某些为它所独有的特色。

可以说，非常的时空条件把大后方抗战文学运动摆到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的一个特殊位置上了。

大后方抗战文学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领导和巧妙的组织领导下开展起来的进步的文学运动。它以重庆为中心，向西南诸省辐射。重庆是国民党政府战时的首都——陪都，是反动政府中枢所在地。西南诸省都是国民党严密统治着的地区。这种空间位置给大后方文学运动带来了许多复杂的因素，再加上这是战争时代。涉及全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战争把不同阶级、集团的人，团聚到了抗日救国的大旗下，但也就为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大后方抗战文学运动带来了不同政治倾向、不同